

中国



丑史

镜鉴

珍藏本



改革出版社

中国丑史镜鉴

卷 二

第五章 明代宦官

一、皇帝的影子王振

对明朝人来说，大宦官王振绝对不是一个陌生的人。这位出生于山西蔚州、被称作有明一代第一大珰的人，自从他进入明成祖皇帝的宫殿那一天起，就埋下了擅权乱政的种子。为了擅权，他曾经千方百计地取得尚在幼冲的英宗皇帝的信任；为了专断，他又在张太后以及内阁大臣之间施展狡诈欺骗的伎俩；更让人感慨的是，他为了耀武扬威，居然说服英宗皇帝御驾亲征瓦剌，以致在土木堡被围困，堂堂大明帝国的天子被俘，而王振也被一名护卫将军在悲愤交加之下用长锤砸死。

历史总是无情的。由王振擅权而导致的土木堡之变居然成为大明帝国由盛转衰的交接点。如果说在此以前，朱明王朝还能够纵横经略、有所作为，颇具升平治世，泱泱大国之风度的话，那么，经过这场风云激荡，则开始步入暮气沉沉、风雨如磐的多事之秋。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在回顾本朝由宦官而引起的无数灾祸的事实时，无不感叹地说：“阉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祸烈也。”

攘权之路

王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有关他的出身和入宫情况似乎一下子很难说清，因为这些史籍中总是有语焉不详而又歧异互见的毛病。有一种说法是，他粗通文墨，由儒士而任教职，但因触犯刑律而被发配充军。这时，正赶上成祖皇帝下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便自阉入宫。在皇宫里，王振先是在东宫服侍仁宗皇帝，以后又在宣德年间陪伴尚在幼冲的太子朱祁镇读书及生活起居。但是，官方的史书《明史》却说他“少选入内书堂”，是皇家内宦官学校的第一批优秀毕业生。这之后才是“侍英宗东宫，为局郎”。还有一种有趣的说法，说他以教职的身份，负责教授宫人读书，所以宫人都尊敬他，称他为“王先生”。然而，无论是自阉入宫也罢，“少选入内书堂”也罢，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他早在成祖皇帝永乐时期已经入宫，并在宣德七年七月，即公元1432年内读书堂建立的当月，就以“太监”的名义奉宣宗皇帝之命去都察院制止左都御史论囚。历事四朝，使他成为资历深厚的大珰；聪



明狡黠，又使他受到皇帝的垂青；而他步入东宫，侍奉未来的天子，则无疑为他日后专权乱政提供了契机。

王振的专权史在正统年间，似乎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七年。这是一幅从隐而不露、暗中攘权到彻底公开、擅权乱政以致败亡的全景图画。这固然是大明帝国宦官之祸愈演愈烈的肇始，但作为明初以来宦官势力日益抬头的历史总结，它留给人们的却是一连串的联想和感叹。

明一代开国之君朱元璋，对于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亡教训十分留意，每读史传，见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以致社稷倾覆，不由不扼腕兴叹。因此，这位开国之君在践祚之始，就对宦官做了严苛的限制。譬如，他曾经大大减少了宫内的宦官人数。又规定了许多戒条：不御外臣冠服，不兼文武官衔，不许干预朝政，不许读书识字，诸司不得与内臣文移往来，内外官不得交结等等。此外，洪武皇帝还特地将一块写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内容的铁牌悬于宫门之上，作为儆戒。这些措施显然是希望把宦官拘囿于供洒扫、备使令一般奴仆式的范围。认识不谓不深，防范不谓不周，措施也不谓不严，然而在日后不久，这种严苛的戒律却变得无足轻重了，宫门之上的那块铸造的铁牌也仅仅成为装饰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宦官专权不仅是封建政治兴衰的寒暑表，更是封建君主专制本身的永远也无法摆脱的痼疾和赘瘤。自从大明帝国建立的那一天起，洪武皇帝就暴风骤雨式地废黜宰相、滥杀功臣，用专制和屠刀，树立起古今中外最独裁的统治形象。在这种形象的威慑作用下，中央和地方官员的权力毫无疑问地得到了缩小和分散；内官与外官、中央与地方、王府与都司等等再也不是一种秩序和协调的关系，而是互相监督、彼此防范，皇帝一统天下，独揽大权的局面在长达近二千年的封建黑暗时代顷刻暴露无遗。

然而，军国大事毕竟千头万绪，依我们这个幅员辽阔，有着几千万人口和上万名官员的大帝国来说，仅靠一个从和尚而成为天子的洪武皇帝负责，似乎根本不可能。据统计，仅洪武十七年，即公元1384年9月14到21日的八天中，全国各种机构呈送的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二百零七件奏札，四百一十一件事。面对着如此纷繁复杂而又必须一一审阅批改，其苦不堪言则是不难想象的。因之，皇帝在着手填补因废宰相而导致皇帝与臣僚之间的空隙之时，就不得不为他身边的宦官开启一些大门。宦官固然不可信，但远离京城，并掌握着军政大权的朝官又岂能让人放心呢？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年间的宦官曾多次被派出传达诏令、汇报军情、观兵阅胜、犒劳将士、监视大臣、察访官吏；核处天下税课、市易马牛，甚至出使周边少数民族及高丽、安南等地。最有意思的是洪武十五年实行的半印勘合制度，这项制度的实行，使皇帝本人唾弃的宦官居然凌驾于朝官之上，因为它规定了外廷及王府重要政务都必须到内府勘合的内容。



如果说，洪武皇帝使用宦官是处于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他的儿子，即以后的成祖皇帝朱棣则是有意提高宦官地位的人。因为他之所以成为金銮殿的主人，与宦官们的鼎力相助分不开的。成祖皇帝登基伊始，就把宦官的名称由监正改为太监，虽然仅为一字之改，但足以使敏感的大臣警觉，后人也忿忿不平地说：“夫天子之亲，乃以太称，今中人之职亦曰太，其礼视汉唐宋止以中名者却盛矣。”不仅如此，成祖皇帝还经常派遣宦官担任出使、专征、监军、出镇等事务，并在永乐十八年，即公元1420年于锦衣卫之外增设东厂。于是，在充任皇帝耳目、刺探臣民隐事之际，宦官的地位和声望也冉冉升起了，而洪、宣之世的票拟制度又使宦官的权力扩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票拟制度乃是大明帝国的特产。内阁大学士用小票墨书对奏章的处理意见，贴在奏疏封面上通过宦官呈报给皇上审定，然后由太监用红笔写出，是为批红、拟票。这种制度的实行无疑使宦官尤其是司礼监太监高踞于内阁臣僚之上，掌握一切法令、政策的最终决定权。与此同时，随着内书堂的建立，一批“习知经史，娴于文墨”的“知识宦官”应运而生，当年洪武皇帝严苛的“内监不得读书识字”的禁令由是不复存在。从这时起，大明帝国开国之君所精心设计的防范宦官的清规戒律，已被他本人和他的子孙们破除殆尽，唯一剩下的仅仅是那块孤零零的铁牌。

然而，无论是太祖皇帝，还是成祖皇帝、宣宗皇帝的宦官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喜悦和攘权。这是由于在他们赫赫威权之上还有一种有形的牵制势力，以致他们还不具备专权的环境。“祖宗成法”的戒条余威尚在；几位皇帝英年有为，精明强干，宽严相济的手法又运用的得体；一群忠诚正直、办事干练的六部官僚和内阁大学士虎视眈眈地监督等等。但到了宣德十年即公元1435年，一场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

这年正月，三十八岁的宣宗皇帝朱瞻基溘然去世，皇太子朱祁镇还是个不满九岁的孩子。当日朝野谣言四起，据说襄王朱瞻埈要继嗣为帝，太皇太后张氏急忙召集文武大臣于乾清宫，泣不成声地指着小太子说：这就是新天子。于是，几位顾命大臣率百官赶紧伏地叩头，三呼万岁。新君即位，谣言乃止。但皇帝正值冲龄，上述所平衡格局便失去了有力的支柱。这时，日夜陪伴皇帝、已攫取司礼监大权的王振便开始成为政治上的明星，所谓宦官只兴风不作浪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从表面上看，王振给人的印象是颇有君子之风的一介书生。他知书达礼，温文尔雅，又为人精明，城府极深，因此在宦官中轻执牛耳，羽毛渐丰。宫里的人都称他为“翁父”，就连英宗皇帝也决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为“先生”。与同时代的同行所不同的是，他除了殷勤地照顾着小皇帝的饮食起居外，还热情地陪伴小皇帝玩耍嬉戏。这对一位不足九岁的顽童来说，不啻是一种快乐的满足。这样说吧，在小皇帝的眼里，王振再也不是什么奴仆，而是唯



一使他欢乐、使他信任、使他依赖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王振能够成为司礼监提督太监就不奇怪了。

司礼监乃内监二十四衙门之首，而提督太监权力最大。它不仅可以调动所有的宦官，而且掌管内外奏章、代拟旨意和批红阅票，成为皇权的化身，皇帝的影子。早在宣宗皇帝在世时，王振就经常为那位目不识丁的司礼太监刘宁受命捉刀。英宗皇帝继位后，王振更是春风得意、权势日隆。这时掌管司礼监的是老太监金英，凭着他的经验，深知自己决不是王振的对手，于是在新皇帝还没有启用年号之前，便乖乖地拱手相让。

司礼监提督太监王振上任之始，一定会仰首伸眉。但是不久，他就遇上了麻烦。据说有一次，张太后召王振到清宁宫，命人将他拿下，以刀加颈，正色道：“你侍奉皇上颇有不轨，应当赐死！”当时王振百般求饶，叩头不止，直到发誓再也不敢引诱皇上胡作非为时，才侥幸释放。这一段故事虽不为官方史书《明史》所载，以张太后的为人秉性来说，似乎也不大可能，但它至少说明如下这样一个问题：本朝沿袭的防范宦官专权的习惯并没有彻底打破，他王振也还不能仅凭着显赫权位就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王振毕竟是王振，他之所以成为有明一代第一大珰，当然有他精明的手腕和对政治运用的娴熟得体。从此他变得更加狡黠，凡事十分注意察言观色，有意无意地树立自己良好的威望，但是一有机会，他就决不会放弃显示自己的无限忠诚和政治才干。

他与英宗皇帝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换言之，已由伙伴进而变成朋友。但司礼太监也无不忧虑地认识到，仅仅靠最幼稚的引逗嬉戏手法并不是件长久的事情。因此，他在充分给予小皇帝欢快的同时，又教给他为人之主所应当具备的能力。比如临朝之时如何显示自己的英明果敢，又如何严刑重典以树立威信，驾驭群臣。甚至在每次皇帝临朝听政，王振总是先利用自己的耳目弄清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以一种负责的态度替皇帝做好准备工作，并叮嘱他处理奏折的方法。王振的预料常常十有九中，从而使小皇帝佩服之至；而大臣们也觉皇上少年老成，遇事不惊，这样的结果自然会出现两种心态，即在颂扬皇上圣明睿智、举止得宜之际又不得不为他的严法威仪颇感畏惧。就后者而言，在正统前期，先后有兵部尚书王骥、礼部尚书胡濙、户部尚书刘中敷、刑部尚书魏源以及无数的侍郎、御史遭受牢狱之灾。尤其是执掌财政的户部，被银铛入狱者最多。尚书刘中敷先是于正统三年，即公元1438年下狱，但因张太后的干预很快赦出复官。三年后，他又一次的与左右侍郎吴玺、陈璘一起坐牢，并且被戴上几十斤重的大枷在长安门罚站了十几天。这就是王振兴起的惩治大臣的“荷校”之刑。最后，虽出狱复官，但一个多月后，三人又第三次下狱。这次下狱并无上几次的幸运，因为恼怒的小皇帝不久即下达了将他们削职和充军戍边的旨意。太皇太后张氏碍于后妃不得干政的祖训，且年事已高，只好由王振和小皇帝任意妄为，她当日唯一能做到的只是些力所



能及的补救罢了。

中华大帝国自从产生宦官这一怪胎时，就似乎有意让它和朝官作对。宦官借助于和皇帝的私人关系，往往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而朝官也充分利用祖宗成法或先朝的事例限制宦官，如此反复的抗争和搏斗，使汉唐宋诸朝，乃至今日的大明帝国生衍出不少的政治悲剧。王振是熟知历史的，他知道只有以小忠小信掩盖其大奸大恶，才能获取那些正直而又讲究道德的大臣，特别是大名鼎鼎的三杨阁老的好感。因之，他每次去内阁办事或传旨之时，总是佯装不敢直入，以预闻内阁政事。三杨见他举止恭顺谨慎，也往往体面地请他进来并让座以示尊重。但真正使三杨改变看法的是从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开始的。一次，英宗皇帝正与小宦官在宫内玩球，小宦官见王振走来慌忙避开。第二天，王振陪英宗皇帝去内阁问政，故意提高嗓门苦苦劝谏说：“先帝因为玩球，几乎误了天下大事，陛下复踵其好，置国家社稷于何地？”此言一出，立即惊动了三杨，以致他们惊叹道：“想不到宦官中还有这样的人才。”

取得太皇太后张氏的信任也同样显得尤为重要。在司礼太监的眼中，她决不只是一位哺育皇子的女人，而是恪守祖训、训练有素的一流政治家。有多少次她千叮万嘱地对顾命大臣们说，要“扶助幼君，同心协力，以安社稷”；又有多少次她亲自处理在别人看来是很为棘手的政务。但是要取得这样一位女人的信任，就必须要有坚定的忍耐心和良好的契机。幸运的是在不长的时间里，契机就降临了。正统四年十月，福建按察金事廖谟公然杖死驿丞，此事一经公开，引起舆论上的愤怒，廖金事也由此被弹劾。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因与那个死去的驿丞是同乡，所以坚决要求“以命抵偿”；而与廖金事同里的杨博则借“以公事论决”为名替他的老乡开脱罪责，官司最后打到太皇太后那里。张太后意识到此事相当棘手，如果处理不当，则两杨势必反目为仇，所谓“同心协力，以安社稷”也就成了问题。于是，她不得不问计于王振。王振说：“二人皆挟乡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宜对品降调。”这一建议竟使太后大为满意。结果，二杨又重新握手言和，那位惊恐万分的廖金事也仅仅降为河间府同知了事。通过这件事情，张太后看到王振确非等闲之辈，于是对他的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唾弃、警觉转而赞赏、倚信。

皇帝的宠爱、太后的倚信、大臣的恭顺无疑使司礼监太监王振雄风大振，从此，他不断地借皇帝名义，打击迫害异己，培植私人党羽，甚至在不征询内阁同意的情况下，矫诏提拔自己的亲信，这在明朝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一时期，他还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足以使他的同事们自叹弗如。其一，正统五年三月，王振锋芒毕露地和三杨阁臣进行了一次谈话，而这些谈话的内容无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王振说：今日的朝政有赖于几位先生的日理万机，但诸公毕竟高年倦勤，以后该当如何？



杨士奇说：老臣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杨荣说：我辈确实耄耋之年，不能再为皇上效力，应当由年轻之人接任。

于是王振大喜过望，第二天便推荐曹鼐等四人入阁。杨士奇眼见大权旁落别人，不免愤愤不平，杨荣却老练达成地解释说，王振已经讨厌我们的存在，如果断然拒绝，哪天从宫中传出令某某人入阁的圣旨，岂不是我们的悲哀？

其二，正统六年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相继落成。英宗皇帝亲临国宴，和百官一起分享着这象征王朝事业兴旺发达的荣光。按明朝礼制，这种场合是宦官身份的人决不能参加的。也许是因为王振不在身边，英宗皇帝有点失魂落魄，心不在焉。于是派人去看望那位留在宫中的“王先生”以示慰藉。不料，来人正碰上“王先生”在宫中大发脾气，且不停地嚷道：“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英宗皇帝急忙下令打开中华门的中间大门，请“王先生”赴宴，而在座的群臣纷纷躬身相迎，望风参拜。昔日的“官奴”俨然一个“太上皇帝”。

就是这样，天子幼冲，母后不中制，百官退让，奸党奉迎，大权遂归于内廷，宦官王振投机揽权，“遂滔天矣”，一步步走上了权力的巅峰。

弄权之时

对司礼监太监王振来说，正统七年不过是他所经历中的平常一年，但又是春风得意、仰首伸眉的一年。这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不幸去世，朝廷里失去了唯一一位能钳制他的人。而当时的内阁，准确地说也失去了它昔日光辉灿烂的时刻。三杨之一的杨荣因接受靖江王朱佐敬的贿赂，已被群情激愤的大臣所不容，再加上王振有意地火上加油，精神随之崩溃，在两年前郁郁而终。杨溥年老多病，无力料理朝政，并在三年以后溘然谢世。当日唯有首辅杨士奇苦苦支撑局面，但就在张太后去世的当月，便遇上了麻烦。十月十三日，泰和一地的百姓公然向朝廷呈送一本奏折，内容是检举杨士奇之子杨稷在家乡横行不法、草菅人命，列举的事例竟有百件之多，牵连达几千人。英宗皇帝当即下令逮捕杨稷及罪重者 30 余人，北京的朝臣也纷纷指责杨士奇管教不严，纵子为恶，王振更是以此为理由，向杨士奇示威、要挟。面对着强大舆论的压力，首辅杨士奇不得不提出致仕，并于二年后在他的家乡含愤而死。至于新科状元出身而刚刚入阁的曹鼐、马愉，此时仍忘情于诗书中的书呆子理想，而根本不可能成为他的政敌。一个由王振——司礼监提督太监统治的时代到来了。这个时代可以他下令毁掉那块可能已经生锈、仍悬挂在宫门之上、写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为界定。



既然司礼太监王振并不是一个正直、善良之辈，因此发生在他身上的诸如独揽大权、卖官鬻爵、招权纳贿、结党营私等等丑恶现象层出不穷也就不怎么奇怪了。他权位显赫，英宗皇帝又倾心向之，这自然为一些朝廷官员乃至公侯勋戚趋附奉承提供了条件，以致流传出不少笑话。工部郎中王祐乃不学无术之人，为图升官发财，竟然连廉耻也不要了。他生来无须，一次司礼太监惊奇地问他为什么不长胡须，此人讨好地说：你老人家无须，儿子岂敢有须？这一故事尽管为多数官员所不齿，但王郎中日后被提升为侍郎却是意料之中的事。

还有一则故事也同样有趣：据说江阴布衣徐颐、常熟魏某都是当地家资万贯的财主，为求得一官半职，居然用重金贿赂王振。作为回报，徐颐得到了中书舍人之职，魏某当上了主事。此口一开，致使本朝官场风气大腐，京官和地方官的人数成倍乃至几倍增长，而徐某、魏某也被好奇地写入史书流传百世，并戏称为“金中书、银主事”。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关于他任用亲族的记录。见诸于史端的，除他的侄子千户王山提升为锦衣卫世袭指挥同知外，尚有正统十年他的另一个侄子王林为锦衣卫世袭指挥金事。

与此同时，王振残害忠良、屠戮异己也似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致“自公侯、驸马、伯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被劾，或下狱，或荷校，甚至遣谪，殆无虚岁。”这固然是奸佞所惯用的伎俩，但不能不说是那位昏庸的君主以及无数的自诩为尽忠正直大臣们的悲哀。不过，假如把这些事例公布于众，那么就决不会是悲哀而是悲愤了。

择其主要的人物及事件公布如下：

大理少卿薛瑄、国子祭酒李时勉，两位道德完美而博学多识的人，只因不肯与王振为伍，薛几于被置于死地；李则戴上大枷在国子监门口荷校多日，后经国子监生千余人苦苦哀求，才恢复其官。

李铎御史从不肯为王振下跪，表现出士大夫的崇高气节，但气节换来的是谪戍铁岭卫。

驸马都尉石璟殴责家中的宦者，虽然这是他家中的私事，但在王振看来，却严重到侮辱其同类的恶意，于是下狱论罪。

内使张环、顾忠以及他们在锦衣卫当差的朋友，曾写匿名信控诉王振专权，结果被“磔于市，不覆奏”。

正统十二年，武功中尉指挥使华嵩因一位俊丽柔情的妓女与王振的侄子争风吃醋，多情的中尉指挥使毕竟势单力薄，被剃光头发，涂上油漆，枷号示众于教坊门口，最后又充军大同卫。当然罪名决不会以道德论处。

杀害侍讲学士刘球一案，似乎是本朝英宗皇帝时期最骇人听闻的惨案。刘球字廷振，安福人，从永乐十九年他为进士开始，就以读书和道德的完美结合，享誉于士林骚客之间。于是他被任命为礼部主事，经胡濙推荐又值经筵，不久改为翰林侍讲。刘侍讲一生的所作所



为，不过是一个正统的用“四书”武装起来的书呆子以道德和责任与谰诈和奸猾的较量，而较量的结果纵使遇上再开明的皇帝，也将不会不是一场悲剧。正统六年，王振为了显示他的军事才干和勇气，怂恿英宗皇帝派大军征讨麓川，身为翰林侍讲的刘球上疏谏阻，虽然此举并未能得到皇帝的同意，但却得罪了司礼监太监本人。两年后，这位刘侍讲因雷震奉天殿一事再次上疏，列举十事，开头便大谈君权不可下移论，接着又声色俱厉地奉劝皇帝“复亲决故事，使权归于一”。这本上疏无疑是公开警告皇帝：你的卧榻之侧，岂容王振这样的奸雄鼾睡？然而奏折并没有引起王振的注意，仅仅按例交付廷议，结果惟“择太常”一事得行。但刘侍讲的同乡钦天监正彭德清却认为这是一个奉承的极好机会，立即向王振作了汇报。接下来便是王振赫然震怒，正巧这时修撰董璘上疏请求改官太常，奉享祀事，于是，这位倒霉的修撰被视为侍讲学士的同谋一起下狱。事已至此，司礼监太监仍然感到不能平此恨，又暗中指使锦衣卫指挥马顺设法除掉刘球。当夜，领命前去的一姓卢的小校持刀进入狱中，将刘球砍下头颅，又把他尸体支解，埋入囚室的门口。据说刘侍讲临死前曾挥臂高呼太祖、太宗，且人头落地时，身体仍直挺站立。他的家属在收敛时，仅仅得到了他的一只手臂和被董修撰收藏的血裙。

侍讲学士刘球不惜以抛弃血肉之躯赢得了名声，他的事迹被载入史册流芳百世并成为后世官吏效仿的楷模。问题是，他甘愿得罪一位“位极人臣”的人而竭力去阻止对麓川的征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说麓川确实需要征伐，那他劝谏的目的又何在？

应该说，经过几代皇帝的悉心治理，大明帝国的边境还是比较平静的。这主要是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采取政治怀柔的羁縻政策和对北方蒙古采取既通好又防御的政策。麓川发生的叛乱早在一年前即正统五年七月就已经平定，而此时为了耀武扬威，王振又决定重新征讨麓川，自然会引引起如刘球一类正直官吏的抵触。英宗皇帝宁肯相信他的“先生”而不相信他的大臣，结果使十五万大军征讨麓川时“死者十七八”，“军赏爵赏不可胜计”，更为可怕的是，西南地区局势从此动荡不安，战争的气氛湮没了和平。与此同时，王振对北方的蒙古瓦剌却曲与委蛇，这一真正的目的在于，用朝廷禁运的物资与瓦剌在边境上进行秘密交易，以牟取暴利，诸如将大量的铁制箭头用大瓮封好送给瓦剌的使臣。随着这种交易的日复一日，耳目通灵的瓦剌人在得到大量装备的同时，又对明朝的边境防务乃至国中虚实了若指掌，以致土木堡一战，大明帝国百万雄师顷刻间不堪一击，不能不说是明证。

王振以赫赫权势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的杀人记录，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正统五年春夏两季，经他发放给僧侣的类似于今日之身份证被称作“度牒”的竟达二万二千三百多个。一时间，大明帝国的首都僧侣充斥，香火袅袅不断，红砖绿瓦沉浸在若神若仙之中。除此之外，修葺佛寺也属必然。先是重修庆寿寺，后改名大兴隆寺，再建



智化寺，以几万军民的大兴土木且修筑的富丽堂皇，在本朝历史上实属罕见。不过，大兴隆寺也好，智化寺也罢，都似乎无法与他的宅第相媲美，因为司礼监太监的官邸乃至服饰器皿的华美程度，与皇家相比至少有过之而无不及。

难道说守成之君对他的王先生宠专弄权、残害忠良真的视而不见？说的严重些，他就不考虑由于王先生的倒行逆施可能会使他的国家危如累卵？但是，距今已死去五百二十六年的英宗皇帝倘若在九泉之下仍有灵知，他一定不会同意我们所提出的疑问。如果不这样，他就不会在正统十一年正月十二日赏赐给他的先生白金、宝楮、彩巾等珍贵礼物；也不会带有感激之情地对王振说：“朕眷念尔贤劳，昕夕不忘，尔尚体至意，始终如一；致我国家有无疆之休，尔亦有无穷之闻。”盛赞他：“性资忠厚，度量宏深”，前后几二十年“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卫调护，克尽乃心，赞翊维持靡所不至，正言忠告，裨益实多。”在英宗皇帝的心目中，王振决不仅仅只是一个伙伴，而是对他关心备至的忠臣。这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他的五十万名将士惨死在土木堡、他身为瓦刺人的俘虏、又返回他的帝国时也同样如此。

土木之败

从洪武皇帝到当今天子，北方的边境并没有出现像北宋、南宋那样的险象环生，这足以使几代皇帝都引以自豪。但自豪的背后，小的不断的各种摩擦也着实令人头疼。幸好我们这个有千年历史的大帝国一向如此，局部的战争和争端无关宏旨。但是英宗皇帝怎么也想不到，当他二十一岁的时候也出现了和北宋徽、钦二帝同样的结局，只不过他比徽、钦二帝更有运气，最后还是回到了首都并又一次作了天子。

元朝自公元1368年灭亡后，蒙古人就退回塞北，建立了被称作“北元”的王朝。然而到十五世纪初，北元又分裂成兀良哈、鞑靼和瓦剌三个部落，后者则经常与明朝兵刃相见。永乐元年，瓦剌首领猛可帖木儿打败鞑靼，但他不久即死去，大权落入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手里。永乐十五年，马哈木儿子脱欢继承已故父亲的王位，先是打败了周围的邻邦，接着又将他父亲的两位战友太平、把秃孛罗杀死，统一了鞑靼、瓦剌两部。这时他已经自任丞相，国君则是元朝后裔脱脱不花可汗。二十一年后即明正统四年，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自称太师。这位蒙古人一上任，就表现出不凡的勇气和胆识，以战争而开拓了疆土，最终统一了北方诸部。这时候，脱脱不花可汗仅仅徒具虚名，而太师也先也因为有可称自豪的万里疆土以及无数的精兵良将不满足于他的国家和明朝原有的政治隶属关系。一场旨在恢复大元统一天下的可怕战争一触即发。

和前朝一样，本朝在与蒙古人的关系上可谓用心良苦。一会儿兴兵征伐，诉诸武力，一



会儿又通好和睦，授爵封王。成祖皇帝曾经派使臣敕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但不久，又先后五次亲征漠北。

此外，明朝与蒙古人的经济联系即“通贡”与“互市”也当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前者是用蒙古的马、骆驼、皮货等畜牧产品进贡，换取本朝的钞币、金银、药品以及绢缎等赏物，后者又称马市，是在政府的控制下定地、定时、定人、定物的民间贸易。在明朝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看来，这些有限的经济往来不过是治边政策的一种继续，目的是借物换心，以示泱泱大国怀柔之义，使慄慄不羁的蒙古人不抚自顺。而蒙古人却将进贡看成是发财的极好机会，最初只派五十名贡使，后来则增至二千余名，且专门索要最贵重的礼物，稍不如意，辄借口制造事端。明朝政府虽碍于体面，尽可能做到有求必应，但年年增赏赐以及无底洞的胃口，也使明朝政府大伤脑筋。一旦岁赐减少或其他问题被作为口实，双方的武装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正统十四年二月，也先又派使臣以惯例来京进贡，号称三千五百人。但专司其事的礼部官员却发现根本没有这么多的使者，这显然是贪图冒领赏赐所采用的计策，而且所进贡的马匹也优劣混杂。司礼监太监王振对蒙古人竟敢戏弄本朝大为光火。他下令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廩饩，并在回赐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瓦剌使者眼看使计不成，又声称这次贡马乃是聘礼，原因是英宗皇帝的使者曾经向他们透露过要以公主嫁给也先之子的消息，然而明廷官员的答复明白无误：本朝根本没有过这样的和亲之事。

这一事件无疑使也先找到了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年七月，他就迫不及待地命令大军分四路大举进攻明朝，而他本人也亲自率领精锐部队袭击大同。顷刻间，长城脚下狼烟四起，战火弥漫，明朝北部边防线迅速崩溃。大同参将吴浩首战失利，在猫儿庄不幸阵亡。驸马都尉井源奉命率万骑出击，结果无一生还。此时驻扎在北边的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都尉石亨与瓦剌大战于大同东北的阳和，只因王振的亲信、监军郭敬调度失宜，以致战机贻误，全军覆没。宋瑛、朱冕阵亡，石亨单骑逃回，郭敬则伏于草丛身免。于是大同门户洞开，边防告急，京师告急。

战败的消息不断传来，京城也日复一日地恐慌。但司礼监太监王振此时却异乎寻常地兴奋，他期待已久的耀武扬威、自以为可以青史扬名的伟大壮举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本朝的皇帝和官员都肯定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即通过个人的非凡才智和不朽的功业赢得臣民和属下的心悦诚服，王振也不例外。多少年来，他位居人臣之上，靠的是皇帝对他的皇恩浩荡，然而仅凭着与皇帝的私人友谊治理天下，似乎并不能为大臣们所认可，那经常不断地足以让他愤怒和难堪的攻击性奏折不就是明证吗？所以一个人要想让全体官员服从于司礼太监麾下，没有可资夸耀的资本是不可能的，而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在战争中建功立业也



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于是，王振竭力劝说英宗皇帝应该像当年他的祖先成祖那样御驾亲征，以代表上天的意志去惩治人间的无道定然成功。而英宗皇帝也觉着带兵打仗是一件好玩而有趣的事，便欣然首肯。但天子准备御驾亲征的消息一经传出，舆论就哄然而起。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可轻出”，皇帝更不能亲临战场；吏部尚书王直率领一批文官伏阙力争；刑部给事中曹凯甚至措词激烈地说：“今日之势，大异澶渊，彼文武忠勇，士马劲悍。今中贵窃权，人心玩愒。此辈不惟以陛下为孤注，即怀、愍、徽、钦亦何暇恤？”然而圣心已定，不可更改，遂于七月十四日下令亲征，诏命太师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部院大臣以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大员数十名扈驾随行，又命太监金英、兵部侍郎并代理兵部事务于谦以及阁臣陈循、苗衷、高谷等辅佐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师。

这次出征真可谓盛况空前，以随从的兵将之众、重臣之多在大明帝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为了充分显示天朝的威武之师，司礼监太监下令兵部在两天之内集结五十万大军，但在这个命令下达的同时，他却疏忽了这样一条最基本的军事原则：即匆匆而调集的军队是否会出现帅领生兵，兵无熟将的情况？五十万人使用的粮草军需又从哪里调拨？尽管兵部真的在两日之内筹集到五十万人；尽管户部急令山西布政使司及顺天、保定等七府的税收送至大同交纳，又令山西各地征民采刈青草交纳；但所看到的依然是一支装备不全、缺乏训练、缺少军需的大军，而且它的统帅所具有的大将才略也着实不敢恭维。这样一支毫无战斗能力的军队，其暗淡前景也就昭然若揭了。

三日后，英宗皇帝亲率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开出北京城，当晚宿营于龙虎台。次日出居庸关、过怀来城向宣府进发。是时连日风雨大作，军中人情汹汹，随军诸臣希望驻蹕于此，但急于立功的“统帅”王振断然拒绝，一路趲行，抵达阳和。阳和是明代士兵望面生畏的地方，因为几天前这里还是浴血奋战的沙场。望着遍野的伏尸，皇帝的将士们不能不为之心寒，唯有皇帝本人和他的王先生士气高昂，充满信心。

也先敢于向天朝兴戎起衅，当然有他的必胜信念。早在英宗皇帝气势汹汹地扬言御驾亲征时，就定下了佯装败退、诱敌深入之策。所以当明朝的大军浩浩荡荡进发，也先却故意班师后撤。明军的侦探向王振详细报告了也先“丢盔弃甲”，使他精神更加大振，于是又继续向北推进，他要让英宗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看看自己是如何谈笑破敌的。八月初一日，明军开进大同。这时兵部尚书邝埜与户部尚书王佐再一次阻挠，请回銮驾；成国公朱勇“膝行而前”；甚至王振的亲信钦天监正彭德清也以“象纬示警”为词谏阻。然而情绪亢奋的司礼太监岂能容许别人横加指责？于是，邝、王尚书被迫罚跪于草丛中一日。对钦天监正的质问“陷御驾于草莽之中，谁执其咎”，王振也轻描淡写地说：“倘如此，亦天命也。”



令人遗憾的是，司礼监太监的雄心壮志毕竟太短暂了，第二天即八月二日，前线败讯就毫不留情地传来，他的亲信监军太监郭敬以沮丧的心情将失败的消息如实禀告，气壮如牛的王振才顿觉事情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美妙。既然命运不给他建功立业的机会，那他也只能下令班师，经过紫荆关，旬日可抵北京。然而王振并不愿意就这样丢人现眼地起驾回銮，这时他打算邀请英宗皇帝绕道到他的蔚州老家，驾幸其第，这当然会又一次遭到随军的文武官员的拒绝，但是以一个堂堂天子的身份下榻到宦者的家里，其本身所带给的影响足以安慰他那颗受到伤害的心灵。可是当大军朝蔚州方向行进至几十里后，他又感到几十万大军经过，必定会踏坏他田里的庄稼，于是又命令向东改道宣府。如此反复无常，既耽误了时间，又给也先以极好的机会。这时瓦剌大军接踵而至，形势危在旦夕，大同参将郭登闻讯，急忙转告曹鼐、张益，应迅速从紫荆关回驾，否则就来不及了，但随即遭到王振拒绝。八月初十日，皇帝的军队退回宣府附近，也先已奔袭而来。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兄弟断后迎敌，不幸兵败战段。十三日，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四万人救援，因此公杀敌心切，竟在鹈儿岭身遭伏击，几乎全军覆灭。十四日，明朝大军退至怀来县西侧的土木堡，许多大臣主张应退回二十里外的怀来县城固守，而王振则以輜重车辆未到，坚持驻扎土木堡。兵部尚书邝埜第三次苦谏，要求率军队保护皇帝疾驰入关，但这一要求又遭到否决。就这样，疲惫不堪的英宗皇帝和他的将士在一无水源，二无险要可守的土木堡驻扎下来。当日笼罩着的唯有灾难和死亡的阴影。

瓦剌大军很快逼近合围。望着气势汹汹的蒙古人，皇帝和他的将士惶惶不安。但更为焦虑的是，土木堡并无水源可饮，即使掘地两丈，仍不见泉水涌出，而南边十余里的河流又为蒙古人所占据。第二天乃为中秋节，也先派使臣持书信来到土木堡，声称愿意与明军求和，并暗示他的军队已经撤离。急于摆脱困境的司礼大监和他的皇上竟不辨真假，忙派使臣去瓦剌军中谈判，甚至不等消息传回，就下令移营取水。饥渴难耐的将士争先恐后地到南河汲水，一时行伍大乱，这正好中了也先的毒计。此时，预先埋伏好的蒙古士兵突然从四面冲杀而来，蒙古铁骑纵横驰骋，犹入无人之境。

这一战是在明军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用史官的话说，被杀和自相践踏而死的“蔽野塞川”，五十万大军及无数的輜重荡然无存，明朝第六代皇帝英宗朱祁镇“北狩”，即不幸被俘，随行的文武大臣绝少幸免，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坝、修武伯沈荣以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尚书邝埜、王佐，侍郎丁铉、王永和等壮烈殉国。至于皇帝的先生、司礼监提督太监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有一种说法是，在英宗皇帝被俘之时，护卫将军樊忠怒不可遏，用长锤将他砸死，并呼喊：我为天下诛此奸贼！这一说法是否真实可靠，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次被称作土木之变



(或因当年为己巳年而称作己巳之变)的事变以后，大明帝国确实走向了衰落，尽管当时的政治家们并不承认这一点。

皇帝被俘于土木堡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在留守北京的官员中引起巨大的震动。八月二十三日，当代理皇帝之职的郕王朱祁钰来到午门时，呈现在他眼前的，是无数双脚进跪、恸哭不止的忠臣良将。这时，左都御史陈锜率领一批大臣慷慨激昂地斥责了王振的种种罪行，并要求“族诛王振，没其家财，以安人心”，郕王朱祁钰仍犹豫不决，王振亲信马顺却不识时务地跳出来要喝逐百官，于是愤怒的官员忍无可忍，给事中王竑、曹凯甚至拥上前揪住马顺，乱打乱踩，顿时“尸暴血流”而亡。接着又将宦官毛贵、王长随当场捶死，王振的侄子王山也被宣布凌迟处死，从前线逃回的监军郭敬则下狱论罪。九月，已经成为大明帝国第七代皇帝代宗朱祁钰特别下诏，他在诏书中写道：凡系王振本宗之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应该斩首；而妇女则赏赐给功臣人家作为奴隶，但已经结婚的可以宽恕死罪，只打一百杖发配到边疆。在下诏的同时，对王振的府第也进行了搜查，搜查的结果令新皇帝和他的大臣瞠目结舌：计有金银六十余库，玉盘上百个，高达六七尺的珊瑚树二十余株，马匹数万，其余珍宝不可胜计。

仅仅一年，英宗皇帝就从蒙古人的营帐里回到了他所熟悉的皇宫。又经过八年的紧锣密鼓的准备，他发动了被史家称作“夺门之变”的政变，推翻景泰皇帝而又一次成为大明帝国的主人。然而，每当他批阅奏折、忙完政务之暇，总是沉浸在对陪伴他二十余年的王先生的痛苦回忆中。这种痛苦的回忆当然会促使他毫不顾忌大臣们的抗议而采纳一名太监的建议，即用木头雕刻成王振的像供奉于智化寺里作为酹祀。此外，他又为已故的司礼太监精心修建了一座精忠祠，一位姓钱名博的才子奉命撰写了文辞华美的墓志铭，极力吹捧王振的“忠烈”。随着寺院里阵阵的木鱼声和袅袅升腾的香火，司礼监太监王振的幽灵仿佛回到了明帝国和这个帝国主人的心灵深处。

上述的行为不能不让人颇为费解。如果说英宗皇帝以前完全是由于尚在冲龄，童心未泯，不辨忠佞的话，那么公元1449年土木堡一役，因为王先生好大喜功，以致皇帝本人蒙受被俘的耻辱还不能使他警觉？也许是历史的误记，冤枉了这位被称为奸臣的宦官？也许英宗皇帝本身就是一个不辨忠佞，毫无思想的傻瓜？回答这些问题似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之我们只好用“昏庸”两字来作为对他的臧否评判，因为这位皇帝在以后还有杀害忠臣于谦的记录。



二、居功不法的曹吉祥

在明朝历史上，继正统年间王振首启宦官干政之端后，天顺初年又出现了一个位高权重的大宦官。他密谋内室，促成了英宗皇帝的复辟，而后居功自傲，广结朋党，排斥异己，权势日盛，后竟发展到阴谋发动叛变、欲取明朝而代之的地步，导演了一场震惊朝廷内外的大事件，此人就是曹吉祥。

密谋夺门 恃功以进

曹吉祥，滦州（治今河北滦县）人。入宫初期，投靠宦官王振门下。正统四年（1439年）朝廷派军队到麓川征讨思任发，曹吉祥担任监军。九年（1444年）与成国公朱勇、太监刘永成、僧保等各率精骑万余人出古北口，征讨蒙古兀良哈部，因功受赏。十三年（1448年）又与宁阳侯陈懋等到福建镇压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为神机营监军，权力极大，可“先斩后奏”。按察副使邵庞誉出师不利，曹吉祥便急速带人捉拿，欲斩杀治罪。幸亏邵庞誉藏于床下而未被拿获，这样才免除一死。曹吉祥每次出兵，都挑选一些勇敢的蕃将和骁勇矫健的士卒隶属自己帐下，回师后则将他们养在家中，因此他家藏有许多盔甲武器和勇士。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曹吉祥伙同武将石亨、官僚徐有贞策划了一起夺门之变，促成了明英宗朱祁镇的复辟。

早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军与蒙古瓦剌部的战争中，发生“土木之败”，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部俘虏，其弟郕王朱祁钰继位做了皇帝，是为明景帝。以后在兵部尚书于谦主持下，力挽危局，击退瓦剌部的进攻，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瓦剌部首领也先感到再挟持英宗威胁明朝已无多大意义，就在景泰元年（1550年）八月初二日将英宗送还明朝。但是，景帝朱祁钰为保住自己的帝位，并不真心希望他哥哥回来。英宗在“土木之败”被俘以前，做了十四年皇帝，朝廷内外都有他的一批心腹，有着雄厚的势力。这次被放回京，朱祁钰才刚刚做了一年皇帝，根基不稳，故内心十分恐惧，害怕皇帝的宝座被他哥哥夺回去。所以在东安门举行授受帝位仪式之后，名义上虽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却立即把他送进南宫（北京南池子）禁锢起来。派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不许群臣去朝见，也不许朱祁镇和廷臣交往，防止他们暗中联络，进行复辟活动。一个叫徐正的官员甚至建议朱祁钰将南城增高数尺，伐去城边高树，将南宫宫门的锁灌上铁汁。朱祁钰表面上为显示自己的宽厚，尊崇兄弟之谊，将徐正给予惩罚，谪戍铁岭卫。实际上则更加严密地防范南宫，把南富及其



附近的树木都砍伐掉。

景泰八年正月，景帝忽得重病，而皇太子尚未确定，宫廷内外都十分忧虑。一日，武清侯石亨奉召入内，见景帝病情日益加重。退出后找到太监曹吉祥、都督张軏，问道：“你们想得功赏吗？”二人十分诧异，忙问何事？石亨说道：“皇上病情已经加重，与其议立太子，不如恢复上皇帝位。”曹吉祥一听，连连称道：“石公好计！石公好计！”他们又到太常卿许彬那里商议。许彬认为这是一件盖世之功，但自己已老，无能为力，于是向他们推荐了右副都御史徐有贞。十四日夜，石亨等聚会徐有贞家，共议复辟大计，并派人秘密告知英宗朱祁镇。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决定于十六日夜里行事。石亨、张軏、曹吉祥、徐有贞等按照各自分工，调兵遣将，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成功。特别是徐有贞，在动身前焚香祝天，默祷一番，随即与家人诀别道：“事成后功在社稷，共享富贵；如果失败，必遭灭族之祸；能归则为人，不归则成鬼矣！”

这天夜里，徐有贞让张軏率千余名军士等待于长安门外，石亨收取了各城门的钥匙，夜四更天气开放长安门，放张軏所带士兵进入皇城。之后徐有贞将城门锁好，以防止外边军队进入，并把门钥匙投入水瓮中。徐有贞、石亨、张軏等率领士兵急速向南宫进发。这时天色晦冥，星月无光，石亨、张軏心中惶惑不安，连问徐有贞此事能办成吗？徐有贞说必成无疑。不多时抵达南宫，宫门坚固，连叩不开。徐有贞命士兵取巨木至，用绳子悬置起来，几十个士兵举木撞门，又命士兵爬墙入内，合力推墙，结果墙毁门开，众人一起拥入南宫。英宗朱祁镇在烛光下单独出见，众人俯伏口呼万岁。徐有贞、石亨等一起对朱祁镇说：“请陛下登位。”呼士兵举舆入内，士兵惊慌不能举，徐有贞等忙搀扶着朱祁镇，出坐乘舆，向奉天殿而行。途中朱祁镇问徐有贞等人官职姓名，各人一一奏对。片刻到达东华门，守门卫士喝令停止行进，朱祁镇厉声答道：“我是太上皇，有事入宫，何人敢拒？”门卫上前探视，果然不错，遂即放行，直入奉天殿。众人扶朱祁镇升座，并高呼万岁，一面敲响钟鼓，大开诸门，此时天色明霁，星月皎然，已是正月十七日的黎明。

当时百官都齐集朝房，等待景帝临朝，忽然听到奉天殿有呼噪声，继而又是钟鼓声，无不感到惊疑。紧接着诸门大开，徐有贞出来大声喊道：“上皇帝复位矣！”催促大家入内朝贺。群臣闻言更觉惊奇，但事出突然，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各整衣冠，登殿排班，三呼万岁。朱祁镇宣谕复位。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又叫“南宫复辟”。第二天英宗下令逮捕少保于谦、大学士王文、陈循、商辂等十多人，后在徐有贞等的唆使下，以意欲谋逆罪杀害了于谦、王文等人，天下冤之。曹吉祥麾下有一指挥名叫朵耳，带着祭品到于谦被害处进行哭奠。曹吉祥知道后把他痛打一顿，第二天复哭奠如故，曹吉祥也无可奈何。